

赵树理研究文丛

〔第一辑〕

走近赵树理

傅书华·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赵树理研究文丛

〔第一辑〕

走近赵树理

傅书华·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近赵树理 / 傅书华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5.10

(赵树理研究文丛. 第1辑)

ISBN 978-7-5378-4514-4

I. ①走… II. ①傅… III. ①赵树理 (1906~1970)
—人物研究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90593 号

书 名 走近赵树理
著 者 傅书华
责任编辑 陈学清
装帧设计 张永文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 (太原发行部)
010-57427866 (北京发行部)
0351-5628688 (总编办)
传 真 0351-5628680 010-57571328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 - mail 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208 千字
印 张 14.5
版 次 2015 年 10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0 月 山西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4514-4
定 价 35.00 元

《赵树理研究文丛》编委会

主 任：杜学文 张志仁

成 员：赵魁元 杨占平 傅书华 和 悦

续小强 宋丽云 贾大一

主 编：赵魁元 杨占平

总序

赵魁元 杨占平

赵树理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人民作家，是20世纪大众化文学的领军人物，在国内外具有非常广泛的知名度。他所实践与倡导的深入生活、反映现实、为普通人写作的文学态度，曾经影响了几代作家、艺术家、评论家，在当今时代仍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赵树理出生在太行山区，虽然没有置身于北京、上海等文化交锋的前沿阵地，但也分明受到了时代潮流的影响，新文化运动的疾风骤雨同样对赵树理年轻的心灵产生了强烈冲击。这让从小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影响的赵树理，能以一种民间姿态、“草根”意识来思考问题；而新文化关于自由、平等，关于科学、民主的追求，又使他比一般人更加敏锐地感受到了对既有一切的不满。于是，在赵树理身上形成了一种“我即是民”“民即是我”，“民”与“我”一体的思想观念。他企望改变中国现实的追求既是改变普通民众命运的努力，更是改变他自己个人命运的努力。

赵树理几十年深深融入农村社会现实生活中，与广大农民群众休戚与共，自觉地把自已当作农民中的一员。他选择这种方式，一方面是为了体验生活，获取创作素材；另一方面是要同农民一道，寻找过好日子的途径，让农民群众能够尽快从千百年的贫穷落后中摆脱出来。因而，他总是心甘情愿地充当农民的代言人，时时处处维护农民的利益，看到农民生活有起色，他就特别欣慰；发现农村政策有失误，农民利益受到损害，他就忧心忡忡；农民的甘苦即是他自己的甘苦，农民的冷暖即是他自身的冷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惦记着的仍然是农民过着艰苦日子。他不像某些知识

分子那样，具有强烈的精英意识，常常站出来指点江山、布坛论道，充当救世主的角色。他要用自己回归到民间，回归到农民之中的实际行动，表明一个作家的态度。

赵树理继承“五四”文学传统，坚持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勇于在创作中提出重大的社会问题；同时，他从民间艺术和古典小说中汲取营养，创造了一种通俗化、大众化的现代小说样式和艺术语言。他的代表作《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三里湾》等，是文学史上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者。我们说，赵树理的创作，完全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文化现象，他身处中国图新求变，努力改革落后面貌的十分特殊的时代，在他人生道路和作品中，折射出普通中国人追求幸福理想、改变自身命运的奋斗历程和精神情怀。

今天，文学已经进入 21 世纪，但赵树理所奉行的做公众的代言人和文学的现实性、人民性、民族性精神，依然有着很强的时代意义和现实价值，依然值得广大作家、艺术家学习，更值得广大理论家研究。

因此，中国赵树理研究会在赵树理诞生 110 周年前夕，隆重推出《赵树理研究文丛》，这是近年来研究赵树理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中国赵树理研究会应当尽到的职责。这套丛书的作者，有供职在各级文联或作家协会的评论家，有大专院校的教授，有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专业人员，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对赵树理做了深刻而广泛的研究。或许他们的某些观点和结论不尽相同，但都是对赵树理研究的开掘，都有可取之处。

我们认为，关于赵树理的研究与写作，同文学创作一样，也是因研究者的身份和习惯各有特点各具风格的；但是，从这套丛书中也能够体现出一些共性来，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有独创性。我们感受到，近年来的赵树理研究，随着研究者对作家资料掌握的丰富多元，也慢慢形成了各自比较明显的观点。作为一种讲求逻辑推理性的思维活动，不少研究者的思维方式，已经从过去只懂得同向性思维逐步向逆向性思维转化。同向性思维往往在研究赵树理的人生经历和作品时，只能跟在作家或作品之后做一些浅层次的阐释，比如，说

赵树理已经体现在作品中的主题、典型人物有什么特点、艺术表现方式是哪种等等，而这些却是作家和读者都大体上明白的事实。然而，逆向性思维则可以充分表达出研究者的独特之处来，因为，这种思维方式，是通过赵树理的人生道路和作品进行反经验的批判性思考，得出一些出乎意料却在情理之中、与众不同却具有创见性的结论来。这种研究用独到的眼光，评判、分析赵树理的人生道路和作品各种内在的和外部的蕴含成分，对公认的和传统的结论提出怀疑，从而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价值体系。正是如此，才体现出研究者的独创性来。

其次是有真情实感。我们常常感到，当今的某些理论家做作家作品研究时，存在着一种浮躁现象，他们从事文学研究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拿到某种学位证书或专业职称，很少去发掘课题的深层次意义。这种现象的出现，既有外在的社会因素，更有研究者本身内在的意图，而这种意图的核心，是缺乏对研究对象真诚的感情。不过，值得欣慰的是，在赵树理研究界，这种情况还比较少见，尤其是这套丛书的作者，都是满怀真情实感在研究赵树理的人生道路和作品。面对一辈子真诚做人、真诚处事的赵树理，面对赵树理决不违心写作的经典作品，研究者们都是用真诚的感情去研究。没有倾情付出的研究者，其文章也只能是精神涣散的体现，枯燥文字的堆积。这套丛书的每一位作者，都具备了真诚的感情，能够体验到赵树理的内心世界，体验到赵树理作品的本真之处，写出的文章不能说篇篇是精品，但都是有见地有思想的作品。

第三是立足现实。应当说，关于赵树理的人生道路和作品研究的现实性，是最能体现一个研究者价值的尺度。我们强调现实性，并不是说一定要把赵树理及其作品与当下人们的生活联系起来进行价值评定，关键是要能用当下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艺术标准去评判赵树理的人生道路和作品，并且能得出独到的看法或结论来，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就可以说是具有了现实性了。之所以说现实性是最能体现一个赵树理研究者价值的尺度，是因为，如果你的研究还停留在以往的观念和思维方式上，得出的结论一定是不新鲜的。一种不新鲜的结论，自然是难有多少价值让人们接受

的。由此可见，现实性是研究的灵魂。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整个社会秩序向规范化发展，文学逐步回归到了自己的应有位置，文学研究，包括赵树理研究也逐渐从尴尬境地走了出来。眼下，作家的创作显得相对轻松；研究者也随之放松了心态，在解决了自身知识积累和生存问题后，选择自己喜欢的作家作品研究和评论，个性得到了相对充分的发挥。应当说，当下的文学研究已经进入比较宽松的环境，对中青年研究者的成长是有益的。我们希望广大有志于赵树理研究的同行们，能够静下心来，不断更新观念，吸取新的研究方法，把赵树理研究推向全新的阶段。

这套《赵树理研究文丛》的出版，得到了山西省委宣传部和晋城市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得到了各位作者的真诚配合，北岳文艺出版社相关领导和责任编辑做了认真的编校工作，我们表示衷心感谢！

二〇一五年八月

在中国 20 世纪文学现代化的进程中，赵树理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巨大存在。他是著名的文学流派“山药蛋派”的开创者。他以自己的人生方式、创作实践、审美范型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做出了深刻的阐释与杰出的贡献，影响了整整一个文学时代并对今天中国的文学运动仍然不断地发生着影响。围绕着赵树理的文学作品，曾经开展过相当充分、深入的研究，也曾经产生过多次见解歧义、意见尖锐对立的争论。这些研究与争论，在许多重要方面显示了 20 世纪中国文学思想的特征、流变，也进一步证实了赵树理存在的价值。当我们于今天的众声喧哗中再次凝视赵树理在大山中静默独行的身影时，当我们在今天再次搜检赵树理走过的时而让我们感到清晰、时而让我们感到模糊的“踪迹”时，我们仍然强烈地感到，赵树理是一座大美不言的无字的丰碑。我们可以一次次读解他并在读解中加深和丰富我们对社会、人生、文学真义的认识，但这种读解还远远没有完成，也许，我们永远不能企及赵树理，只能走近赵树理。

目 录

前言 走近赵树理	/001
----------	------

第一章 赵树理人生形态的典型意义	/001
------------------	------

第一节 生命形态及其典型意义	/001
----------------	------

第二节 社会站位及其典型意义	/013
----------------	------

第二章 赵树理小说的创作道路	/022
----------------	------

第一节 终于成长为“一株子大树子”	/022
-------------------	------

第二节 “成为参天拔地的大树林子”	/026
-------------------	------

第三节 狂风恶雨中枝干的挺立与萧瑟	/031
-------------------	------

第三章 赵树理小说的创作范型	/035
----------------	------

第一节 写作身份	/035
----------	------

第二节 艺术把握世界的方式	/038
---------------	------

第三节 典型人物的成型方式及典型人物的塑造	/050
-----------------------	------

第四章 赵树理与“五四”文学	/056
----------------	------

第一节 个体日常生存	/057
------------	------

第二节	对“人”的揭示层面	/060
第三节	解构国家、阶级、“整体”神话	/070
第四节	两种乡村文学	/075
第五节	赵树理小说延续、发展“人的文学”的文学史意义	/077
第五章	赵树理与工农兵文学	/081
第一节	赵树理与兴起、奠基期的工农兵文学	/081
第二节	赵树理与发展及高潮期的工农兵文学	/085
第三节	赵树理与下滑消亡期的工农兵文学	/089
第六章	赵树理与“山药蛋派”（上）	/093
第一节	“山药蛋派”作家的代际构成	/095
第二节	“山药蛋派”的形成与发展	/101
第七章	赵树理与“山药蛋派”（下）	/113
第一节	山西作家群流变中的精神演化	/113
第二节	实用与超越	/125
第八章	赵树理文艺创作中的三晋文化特质及其深远影响	/138
第一节	生存需求第一 现实存在至上	/140
第二节	维护价值基点的坚定立场与开放胸怀	/145
第三节	深远的影响	/150

第九章 在赵树理的身后（上）	/155
第一节 梦幻中的现实	/155
第二节 张石山“家族小说”的文化意蕴	/166
第三节 情感与理念的倾斜	/173
第四节 真实／现实主义的力量及其现实意义	/181
第十章 在赵树理的身后（下）	/190
第一节 山西赵树理研究概况	/190
第二节 关于赵树理和“山药蛋派”的几个问题	/197
第三节 走近赵树理	/206
后记 不禁想起赵树理	/212



赵树理人生形态的典型意义

第一节 生命形态及其典型意义

语云：文如其人。风格即人。走近赵树理，先从走近赵树理的个人生命形态入手也许不失为一个好的角度。

赵树理从小在乡村农家长大，深受乡村生活乡村文化的影响，查阅赵树理的生平自述，查阅对赵树理的回忆文章，可知赵树理生长于一个尚可以维持生计的农家，小时与伙伴玩耍于乡间，稍长又痴迷于乡村戏剧，其祖父粗通文墨，且对幼时的赵树理管教甚严，规训其积福行善、敬惜字纸等等。这样的乡村生活经验，这样的乡村文化熏陶，这样的少儿时代的生命记忆，对赵树理一生的生命形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他生活在京城，但也对作为乡村的家乡的生活方式、情趣有着无法改变的嗜好：家乡的小米、卤面是那么合他的胃口，以至于他会屡屡独自避开热闹的酒宴远去；只要有机会会有时间，他就会不管别人是否听得进去，一个人自得其乐地来一段家乡戏。对于城市文化，他却怎

么也不感兴趣，“王春邀他去游天坛，他迅速地转了一圈，连说没意思，干脆蹲在地下抽起烟来”^①。去苏联访问，对异国风光也没有兴趣，印象淡薄之极。

在他成为著名的大作家后，却并不像人们传统印象中的“作家”，而更像一个农民。“是的，老赵的确好像是一个地道的农民——一个知识分子化了的典型农民，因为他不仅懂得农民的思想感情、生活习惯，而且他自己的一举一动，也活像一个农民一样。他有时穿一身老百姓衣服，腰里束着一根腰带，脚上扎了一副腿带，嘴里衔着一根烟袋，手里拿着一块打火石”^②。赵树理的女儿曾回忆说：“对于农活，无论是耕地、摇耒，还是扬场、撒粪，没有一样能难住他。父亲还会编簸箕、箩筐和小篮。他下乡，经常是赶上什么活都能跟上社员干，这使他非常容易接近群众。”^③

其实，对于作家的身份、职业，赵树理有着自己来自山西乡间的独特理解。不以大作家自居而以普通人的身份出现，这是赵树理的口碑所在。如果究其实，我们会发现，赵树理在意识深处之所以没有视作家为高人一等，实在是因为赵树理认为写作小说只是解决农村实际问题的一种手段，一种工作方式。所以，赵树理到农村更热衷于从事实际的工作。赵广建曾经好奇地看到过赵树理的笔记本，发现上面几乎没有任何关于写作小说的内容，而几乎全是记录农村干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的工作笔记。^④所以，当写小说一旦不能有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时，赵树理就会对小说写作这种生命的存在方式产生怀疑。他在因上书《红旗》反对“大跃进”、公社化“左”的做法而受到批判，因自己的写作不符合当时的政策而产生苦闷时，曾屡次表示愿意不当作家而做农村实际工作，并曾对康濯说：“如果需要我去亚非拉人民中去做点工作，我倒真想去，热热闹闹地干一干哩！”^⑤越到晚年，因为其时的文学写作日益脱离农村现实，他越陷入“真的不能写，

① 戴光宗：《赵树理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70 页。

② 陈艾：《关于赵树理》，见《赵树理研究资料》，北岳文艺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4 页。

③④ 赵广建：《回忆我的父亲赵树理》，见《赵树理研究资料》，北岳文艺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53 页。

⑤ 康濯：《根深土厚》，见《赵树理研究资料》，北岳文艺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61 页。

假的不愿写”的苦恼中，也就越对小说的写作产生怀疑。在他看来，小说的写作，是解决现实问题的一种实际工作方式，如果它远离了现实问题的解决，而且在远离中还反而会给这种写作、写作者带来虚幻的光圈时，那么，这种写作活动就只能使他感到厌恶。如果说，1950年代他在《不要有这样多的幻想吧——答长沙地质学校夏可为同学的信》中，还由于当时小说远离生活之风不盛，由于是对生活中真实的青年讲话而更多劝诫的话，那么，到了他晚年所作《卖烟叶》中，他通过贾鸿年形象的塑造则对这种写作活动即写作的虚伪性、名利性感到极为厌恶。

情爱婚姻对个人生命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与意义：“五四”一代作家与社会的冲突，既是他们所代表所反映的社会群体利益与社会政治、文化的冲突，也是他们作为个体生命与社会的冲突，其中主要的一部分体现在个人生命、婚恋形态与社会的冲突上。翻检“五四”一代作家，少有例外。譬如郭沫若与安娜、鲁迅与许广平、郁达夫与王映霞、胡适与曹诚英、茅盾与秦德君等等。赵树理的两次婚姻，最初均无爱情可言，据他自述：“我对于个人的生活已毫无兴趣了，这样也好，那样也好，我都不在乎。可是家里需要个干家务活的。我自己并不操心这件事，就听任父母张罗说亲。这种态度大概是听天由命吧。”^①赵树理的生活长期漂泊不定，但赵树理一生中也没有一个情爱浪漫的故事，且生活十分严谨。这样的一种个人生活形态与农民对个人生活的价值选择是十分一致的，在以农村为载体的传统文化占上风的根据地、建国之后的作家中也是十分普遍的，且与“五四”时代构成一种鲜明的对照。

读书，是作家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但中国乡村生活情趣使赵树理对西方文学名著、对西方文艺理论经典著作始终兴味不浓——虽然他认真地读过许多的西方名著，甚至能够大段大段地给以背诵。建国初胡乔木曾专门让他住进中南海庆云堂，解除一切工作，闭门读书，并亲自为他选定了一批外国名著与西方文艺理论经典之作，这之后身为作协党组书记

^① 戴光宗：《赵树理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83页。

的邵荃麟也曾做过类似的工作，但对于赵树理来说，始终效果不大，不能融入他的生命，成为他的血肉。

建国之后，文艺领域思想改造运动、政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文艺界人士为跟上形势，纷纷表态发言，甚至踊跃上阵。在这方面，赵树理却出奇地沉默。即使一向与他不合且看不起他的丁玲等被划为右派，赵树理也基本上保持了沉默。贾植芳曾说过：“我……曾阅读了所能找到的赵树理的各类作品和这些年来关于赵树理研究的文章，我觉得……虽然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也不得不写一些表态性的批判文章，但都写得简简单单，履行公事一般，没有那一种声色俱厉状……这些文章都是对事不对人。”^①不能仅仅用农民的忠厚来概括此举，更不能说赵树理不愿介入冲突，你只要看看赵树理为弘扬大众文化在边区文化工作会上力战群雄，在1959年反右倾时的拒不认错的壮举，就可以知道赵树理是多么敢于在冲突中坚持自己的立场了。之所以在批判运动中出奇地沉默，是因为他认为这些运动与农民的生活、命运，与他为农民服务的文学创作没有直接的关系，其根本原因也还是这些运动与他的以农民、乡村为自己根基的生命形态无关。

赵树理的这一生命形态，对其创作有着根本性的影响，在中国新文学史上，也自有其典型性。

中国的文学创作，一向有“为时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传统，这种传统即使在全面批判传统的“五四”时代也没有中断。鲁迅的写作是为着唤醒民众，在进入到变动社会的政治革命的运作阶段，鲁迅也有着“一首诗吓不倒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打跑了”^②的感叹，他之所以牺牲个体内在的丰富的感情世界停止了小说创作而转入杂文创作，直接服务于政治革命，这未尝不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郭沫若的从军北伐，他的创作转型，他在“文革”时的“烧书”举动，还有茅盾在现代文学史位置的奠定，均可以作如是观。赵树理将文学创作，视为改造乡村的一种实际性工作，正是延续

① 贾植芳：《他的文学生命就是真实》，《赵树理研究文集》上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194页。

② 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选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40页。

这一传统而来，或者说，是这一生命形态、创作形态在 1940 年代之后的展现。也正因此，在中国的历史进程社会变动中，作家与政治的冲突成了一种不可逃避的宿命。读赵树理的传记材料，我们可以发现，赵树理三次担任县委副书记职务，但都与县委不能步调一致，其差异即在于步调统一的政策与社会现实生活的不一致而造成的。差异、冲突最强烈的一次是“大跃进”年代，作为县委副书记的赵树理在大会上就密植、施肥、生产进度问题与县委书记公然唱反调，以至于冲突到会议不能进行，以至于县委要背着赵树理来决定问题。这种冲突的痛苦，导致赵树理在 1958 年上书党中央的机关刊物《红旗》，与“大跃进”大唱反调，被认为与彭德怀是一个声音而在中国作协受到了大规模的批判。但几年之后，随着七千人大会的召开，更为敏感的文艺界，作为中国作协领导人的邵荃麟却在“大连会议”上旗帜鲜明地为赵树理平反，虽然在其后的政治运动中，邵荃麟们也与赵树理一样遭到批判，但与社会政治的冲突却构成了他们共同的生命主色调。

建国之后，虽然时代的重心开始从农村转向城市，从传统转向现代，但建立于乡村的传统文化潮流却仍然以其巨大惯性汹涌向前，农村，成为人们充实精神、情感的家园，忘记、背弃农村则是耻辱卑鄙的标志。即如赵树理，虽然居于京华，但北京的家犹如客店一般，只要一有时间，他就会回到他熟悉的晋东南去。尽管他也曾去北京的工厂、天桥深入过生活，尽管他也曾有过写工人、写城市的打算，但他终究与城市生活、都市文化十分隔膜——虽然北京作为文化古城，现代都市之风远不及上海等沿海城市为烈，传统文化氛围十分浓厚。然而赵树理一回到乡下，就犹如虎入深山、龙归大海一般，腾挪跌打，皆成气势。赵树理的这样一种生活、人生方式，在当代是颇具代表性的。譬如柳青离开京华，一去陕西长安皇甫村即十四年，譬如马烽离开京华回到山西故土，康濯回到河北等等。其时社会、文坛也将之视为具有普遍性的“深入生活”的形式。由于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由于中国革命的主要根据地在农村，所以，在革命过程中培养出来的作家对农村有着天然的亲和力，使他们重新回到了自己熟悉的地方，使他们贴近了正在发展中的农村现实，从而出现了一大